

9月，初秋送爽，收到一位編委朋友來信：「我剛剛讀了8月號的《二十一世紀》，感覺這期編得很好，好文章較多：魯利玲談中國改革，叢小平談30年代師範學校與中國革命，關信基談香港政治發展，郭永勝談蘇聯不同政見者，以及孫隆基、羅志田等文章，都是上選的好題材和好文章。」一期之中，能有兩三篇文章引起讀者的重視，對編者已是很大的安慰，更遑論這位朋友一口氣列出六篇文章稱讚。

實際上，編者的緊張感不僅是來自外界對刊物的評論，更來自於編者內心的壓力：在一個據說思想已失去吸引力、甚至人們也不再希望有堅定信仰的時代，更需要堅持刊物的思想性和言論自由，謹此與各地作者、讀者朋友共勉。

——編者

香港政治發展的示範作用

關信基在〈政治發展的釋義與對香港的思索〉（《二十一世紀》2006年8月號）一文中提出，發展內含進步取向，其最終之意在於「人的尊嚴的保障」和「人的價值位階的提升」，這種發展觀的實現最終落基於自由民主的制度安排。在真正的自由民主制度下，個人自由平等，但並非自由到純粹個人本位，也不平等到極端民粹立場，而是維持溫良中道的政治秩序。公民具有公共關懷和參與意識，對共同體認同關愛，並且能夠實現「認同視野的不

三邊互動 三邊互動 三邊互動

斷擴大」，而不是「收縮於狹窄的社群之中」。這便是作者的政治發展觀。由這樣的政治發展觀參照當下的香港社會，作者期望自由民主制度下的香港，能保有自身基於自由與秩序的獨特性，實現從「爭生存」到「求認同」的跨越，並走向認同視野的擴張，起到政治發展示範作用，甚至可以作為整個中國政治發展的借鑑。

政治哲學層面的理論圖景，猶如澄明的鏡子，告知人們永遠不能放棄努力的理想訴求。只是當理論照進現實，一切卻全都複雜起來。「九七」後的香港，如何保持自身的獨特性，本身就是一件需要智慧和勇氣的事情。2003年以來的香港政局可謂跌宕起伏，但並不影響理論圖景的參照意義，也不應就此消滅人們的努力追求；或許更需要人們實實在在的具體行動。

梁旭日 南京
2006.9.2

「邊緣知識份子」的橋樑作用

叢小平的〈通向鄉村革命的橋樑：三十年代地方師範學

校與中國共產主義的轉型〉（《二十一世紀》2006年8月號）引起我極大興趣。該文分析論述了鄉村師範學生作為「邊緣知識份子」所起到的橋樑或紐帶作用。從馬克思主義「階級分析」的觀點看，這個群體的社會身份是十分特殊的，他們所受到的教育使得他們不同於一般的工農大眾；但是由於自身的和社會的種種因素的限制，他們又無法進一步融入當時的上層社會。這種特定的社會身份在常態的社會條件下似乎顯得十分尷尬，但是在革命年代卻成為一種不可多得的優勢：他們的家庭出身、社會地位使他們與社會底層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而他們所受到的教育又使他們在智識和能力方面脫穎而出，最終得以成為底層民眾的領導者和代言人。

中國歷史上的農民運動真正以貧苦農民為領袖的似乎很少，絕大多數農民運動的領袖都是一些「邊緣人物」——如破落鄉紳、落第秀才、中下級軍官、幫會首領、小商小販等等。近代以來社會運動的一個突出變化是「主義」的引入。但正如叢文所展現的，所謂「中國化」其實再次凸現了「傳高義命題」：究竟是「主義」改

造了中國人，還是中國人改造了「主義」？

董國強 南京
2006.9.2

國家與社會的博弈

從2004年開始，便有一個民間自發的「改革共識是否已經破裂」的爭論，這個爭論最終以政府的「繼續改革」口號告終，但是，最重要的問題是，要怎樣繼續改革。

魯利玲在〈中國改革的歷史抉擇〉（《二十一世紀》2006年8月號）一文中提出來的解決辦法——「推進政治體制改革」，應該是大多數中國知識份子的共識，也是大多數弱勢群體意識到自己的合法權益正在遭受剝奪之後的共識。事實上，中國的改革可以表達為國家與社會的博弈過程。國家權力是一隻有形的手，這隻手借助1949年以後建立的政治體制，伸向社會的方方面面，而在1978年之後的改革開放中開始放鬆，放出一塊叫「市場」的生機勃勃的領地。隨着中國社會的日益分化，民主已經從以前的一句政治口號，一個政治理想，轉化成一種社會需要。因此在今天，這隻手只有更加放開，讓市場化在法治的環境中自發地催生一個成熟的公民社會，才能保障弱勢群體的利益，保障國家的穩定。

陳壁生 廣州
2006.9.4

主流經濟學的失靈體現在哪裏？

文貫中〈自由競爭市場與如何分享繁榮〉（《二十一世紀》

2006年8月號）一文的目的是從市場化的改革方向和經濟學理論兩個角度為主流經濟學家提出辯護，但我認為這種辯護卻沒有找準目標。

如果說經濟學和經濟學家可以影響社會公平，那麼它只可能通過影響經濟政策的方式來影響社會分配格局。在中國，經濟學家提供的知識並非主流經濟學理論，而是關於經濟轉型的理論，是關於經濟改革的政策支持。

於是〈自由競爭市場與如何分享繁榮〉一文的問題出來了，如果說中國的主流經濟學家造成了不適當的影響，造成了社會公平的闕失，那麼其原因除了人格方面，在知識方面體現在他們關於轉型的理論上的問題，而不是主流經濟學理論的問題。主流經濟學沒有問題，市場化改革方向也沒有問題，問題出在他們提供的知識與現實之間出現偏差。

對於轉型國家而言，市場均衡僅僅是目標，而改革政策必然要結合現實。如果轉型是為了公平，為了人民的福利，那麼在改革過程如何保障已有的福利，維持現有的社會公正水平，則正是轉型理論研究的重點。但我們卻看到，中國的主流經濟學家在否定計劃經濟體制時，順便把一個現代政府的基本義務：提供國民基本生存保障也一併否定掉了，並美其名曰陣痛。

改革需要轉變分配方式，這個過程中必然會有部分在知識、技能等方面準備不足的群體會因收入減少而陷入困境，如何幫助這些群體渡過困難，融入市場環境應該是改革過程所涉及的重點問題，也應該是經濟學家考慮的核心問題，但

他們完全忽視了這一點，改革變成了一個只有結果沒有過程的「事件」。正是在這種思想的指導下，才導致中國社會觸目驚心的現實，而主流經濟學的失靈也體現於此。

楊濤 湖北
2006.9.7

改革之路的困境

文貫中的〈自由競爭市場與如何分享繁榮〉一文對當前的改革提出尖銳問題。確實，雖然大陸曾有過崇高的社會理想和實踐的「試驗」，但最終還是重新建立市場體制並再融入世界經濟之中，並分享由此帶來的繁榮。

近三十年的市場化改革成績斐然，然而經濟增長卻出現更大更多的腐敗，低收入群體仍然相對貧困，教育、醫療、社會保障和住房方面的支出與收入之間的對比形成更大的生活壓力。改革中出現的問題也就增加了某種「政治正確」的正確性，出現反思改革、質疑改革甚至反對改革的「強大」力量。

本來，改革會影響社會的利益格局，在牽涉到自身利益的時候，人們會權衡取捨，爭取自己的權益，這本來是經濟學的基本原理。那些反對西方經濟學「理性人」假設來阻礙市場化改革的人，也不過是出於利益之爭而已，不管其有甚麼利益或代表甚麼利益。因此，其本身就已經違背了自己的「正確」觀點了。

孔善廣 佛山
2006.9.3